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海洋神灵

——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

王荣国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D527

海洋神灵

——中国海神信仰与社会经济

(中)

王荣国\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 洋
中 国
与 界
世 界
丛 书

第四章

渔歌声中的香火

海洋渔民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走向海洋的人群，海洋捕捞是人类最早的经济活动与产业之一。由于大海浩瀚、风涛莫测与渔业生产的丰欠所具有的偶然性，从而决定了海洋生产与生活中更多地和海神信仰发生联系。

○ 海洋渔业的发展历程

我国大陆的东部面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海岸线跨越寒带、温带与热带，加上寒暖二流交错，海洋渔场区域广阔，海洋鱼类种类多达千种，渔产资源丰富。在石器时代，我国沿海已



经生活着古人类，先民们就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源，以采拾蛤、蚶、蚝蛎等贝类与捕鱼为生。先民们最早采用的捕鱼工具应是鱼镖、鱼叉、鱼钩，其后又出现新的渔具——渔网。浙江吴兴等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石制、陶制的网坠与木鱼标，说明当时已经采用渔网捕鱼。1974年在山东胶东三里河一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海鱼骨骼，经过鉴定为鳓鱼、梭鱼、黑鲷以及蓝点马鲛4种海产鱼类。其中蓝点马鲛属于外海性游动迅速的鱼类。能够捕获这种鱼类说明当时捕鱼技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可能已经使用小型船只进行浅海捕捞。我国北起辽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地带和海岛大都分布着贝丘遗址，这些遗址主要是生活在这一带的东夷族人与古越族人食用后的贝类介壳等遗弃物堆积而成的。

夏商周时期我国的海洋渔业有了初步的发展。夏代已能捕获大鱼。据《竹书纪年》记载可知，夏朝的帝芒曾“狩于海，获大鱼”。^①夏王捕获大鱼的方法很可能是用带索的标或箭射杀的。后来，秦始皇派人在海上射杀鲨鱼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后代用带索的标枪、炮射杀鲸鱼就是由标、箭射法演

^① [梁] 沈约注：《竹书纪年·卷上·帝芒》，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变而来的。夏朝以后海洋捕鱼技术又有了发展。据《管子》一书记载，当时“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①说明当时的渔民已经能够远离海岸到比较深的海域捕鱼，这表明渔船捕鱼技术已经相当进步。由于深海捕鱼的发展，捕鱼量大增，海洋渔业已经成为沿海诸侯国重要的经济来源与生活支柱。齐国“通渔盐之利，国以殷富”^②，燕国有“渔盐枣栗之饶”^③，越国“饭稻羹鱼”^④。这些国家都成为当时的“海王之国”，也就是海洋之国。

秦汉时期我国渔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秦汉时常用的船只的载重量可达25吨至30吨，甚至还有更大的，船上已有帆、橹、锚、舵等设备。^⑤这就为海洋渔业捕捞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渔船，对渔业生

① [汉] 刘向校、[清] 戴望校正：《管子校正·卷十七·禁藏第五十三》，《诸子集成》，团结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5卷第760页。

② [清] 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卷十八·齐桓公之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第八下》，《二十四史》（缩印本），第2册第426页。

④ 《史记·卷百二十九·货殖列传》，《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册第827页。

⑤ 上海交通大学“造船史话”组：《秦汉时期的船舶》，《文物》，1977年（4）。



产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秦始皇东巡时曾乘船出海，“令人海者齎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① 汉代也多有出“大鱼”的记载。而捕获大鱼，只有使用大型的渔船才能远离海岸，等候大鱼出来施放连弩。同时，出现了罾、罩、罾等新的捕鱼网具与方法。由于渔船与捕鱼工具的进步，促使海洋渔业进一步发展。西汉时开始征收海洋渔业税，即“海租”，^② 表明当时海洋渔业生产已有相当的规模。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时期，我国海洋渔业持续发展，但主要以近海采捕为主。到了宋代，我国海洋渔业有比较大的发展。特别是浙闽二省，人多地少，成为我国海洋渔业发达的地区。浙江的舟山一带海域已成为宋代我国重要的渔场。当时渔民已经掌握了鲈鱼、石首鱼（大黄花鱼）、春鱼（小黄花鱼）的洄游规律并适时捕取。春夏之交是捕“石首鱼”的季节，每年三四月间，浙东、福建沿海七郡渔民“出洋取之者，多至百万艘”。^③

①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四史》（缩印本），第1册第71页。

②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二十四史》（缩印本），第2册第296页。

③ [宋]罗潜：《宝庆四明志·卷四·叙产》，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宋代将沿海有船的民户载之户籍，称之为“船户”。据有人统计，浙东的温州、明州、台州三郡以渔为业的船户不少于 15400 余户。^① 前述所谓“百万艘”虽不免夸大，但如果以浙东的温、明、台三州的渔船数推算也应当有几万艘。由于渔业的发展，在城市中出现贩鱼的“鱼行”。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我国古代海洋渔业发展到高峰。在渔场开发方面，据研究表明，几乎现在沿海所有的渔场在当时都得到开发，所不同的只是开发程度上的差别。^② 在捕鱼工具与方法方面，捕鱼工具趋于多样化。仅就广东而言，据《广东新语》记载，“渔具多种，其最大者曰罟，次曰罾。”罟之类有深罟、縠罟、板罟、围罟、墙罟，罾之类有绉罾、沉罾、绞罾、车罾等。同时还能够掌握鱼类的回游规律、鱼类的趋光、趋声等特点进行捕取，极大地促进了明清时代海洋渔业生产的发展。^③

综观当时的捕鱼活动，大致可分为沿岸海域捕

① 魏天安：《宋代渔业概观》，《中州学刊》，1988 年（6）。

② 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年 11 月版，第 20 页。

③ [清]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二十二·渔具》，中华书局，1985 年 4 月版，下册第 560～563 页。



鱼与近海海域捕鱼。沿岸海域采捕通常是在紧靠海岸的浅海地带，其采捕形式为：（1）讨小海。这一地带有些地方退潮后就是滩涂，沿海民众大多在滩涂上培植海蛭、海蛎，采捕虾蟹螺蛤。其培植方法、方式多样，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不拟详述。（2）从事捕鱼。其捕鱼的网具与方法多种多样，因地制宜。有在濒海之地筑堤围并设闸门，按时启闭。潮涨时则启动闸门，鱼虾之类乘潮流而入，然后设网拦之。有的是退潮时收集网内的鱼虾，有的则是定期前去收集网内的鱼虾，有的地方称之“放湖”。散文家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描写他在新加坡一个小岛上拜访华人林在有老人的情景时，这样写道：老人领着他到海滩，“那里有一个不小的鱼塘，鱼塘靠海的一边有一道坚固的闸门。到这里才知道，这是老人近年来的生活来源。这个鱼塘和闸门，可以在潮涨潮落之间为老人提供为数可观的海鲜，大部分出售，小部分自享……”。^① 华人林在有老人所用的捕鱼方法应与“放湖”相似。个体渔户也有使用抄网或罾等。罾出现于秦汉，后代继续沿用，树立四根木桩于海中，将网挂于水，用

^① 余秋雨：《文化苦旅》，知识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277页。

“车挽之上下”。就是说罾是用简单机械升降的捕鱼工具。罾也有不必固定于一处而随人移动全凭双手操作的。从事这类捕鱼的渔民一般不用渔船，人生风险小，安全比较有保障，但渔获量不会很大。

打桩张网是沿海比较普遍的捕鱼方式，就是在沿着海岸的浅海处将木桩打入海底，成排加以固定，再在桩上系网具，网口朝向潮流，能够拦截随潮而入的鱼虾。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都有用此法捕鱼，只是各地名称不一，如辽宁称袖网，山东称挂子网，广东称大罾等，这种捕鱼法要使用渔船按时收鱼。山东沿海有的地方则不需打桩，其

“海上捕鱼所用之网，名曰作网，以绳结成，其目四寸以上，上网有浮木，下网有坠石，每网一贴，约长二丈，阔一丈五尺，数十家合伙出网，相连而用，网至百则，则长二百丈。乘海潮正满，众乘筏载网，周围布之于水，待潮退动，鱼皆满网中，众齐力拽网而上。若鱼多过重，拽不能胜，则稍裂网，纵鱼少逸去，然后拽



之登岸，可得杂鱼巨细数万，堆列若巨邱，贩夫荷担云集，发至竟日鱼方尽。”^①

也有驾渔船使用罾进行捕鱼的，也有驾渔船放钓捕鱼的，这种依靠渔船在比较深的海中进行各种方式的捕鱼，渔获量比在海岸边捕鱼要多，但渔民的人身危险性也相应增大。

近海捕鱼就是在近海海域的岛屿带附近的“近海渔场”进行捕鱼或钓鱼，渔获量相当大。大黄花鱼的主要渔场是江苏、浙江和福建沿海产卵场，小黄花鱼的渔场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沿海，渤海古利津和望海寨渔场是闻名的小黄花鱼渔场。这些渔场都有明显的渔汛期，如黄花鱼渔汛、带鱼渔汛等。大黄花鱼汛期在农历三月至五月期间。浙江舟山渔场的黄花鱼渔汛一到，除了浙江渔民网捕外，江苏、福建乃至广东的渔民也都远道前往网捕。雍正朝，每当春季黄鱼汛，前来舟山捕鱼的闽船与江南沙船共计约一千二百余艘。苏松淡水门渔场是“产黄鱼的渊薮”。每年四五月黄花鱼

^①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四十二·山东八·捕鱼》，慎记书庄石印本。

汛期至，“潮大势急，则推鱼而至”。^① 不仅苏松渔民，浙江宁波、台州、温州的渔民也蜂拥而至。据记载：“计宁、台、温大小舡以万计，苏松沙舡以数百计。”^② 带鱼分布于沿海各地，而浙江舟山一带则是主要的带鱼渔场。同样，在带鱼汛期，沿海数省渔民都聚集钓带鱼。如乾隆朝，浙江定海一位官员指出：“福建渔船，……冬汛钓鲱，来至定海、镇海、象山三县地方”，共计约千余艘。^③ 据陈训正、马瀛的《定海县志》记载，清中晚期定海的渔船可分为宁波、台温、福建三帮。^④ 又载，福建帮钓冬船（钓带鱼船），有大钓、小钓之别，大钓容量约十万斤（50吨），小钓容量七八千斤（约4吨），总共约有五六百号。^⑤ 在近海渔场捕鱼的渔获量都比较大，危险性也增大，特别是到外省渔场的远航捕鱼，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如福建渔民前往浙江钓带鱼通常是霜降出洋，次年谷雨回洋，

①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二·江南·十》。

② [清]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二·江南·十》。

③ 《福建省例》，（台北）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版，下册第623～625页。

④ [民国] 陈训正、马瀛：《定海县志》册一，《舆地》，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11月影印，第47页。

⑤ [民国] 陈训正、马瀛：《定海县志·册一·舆地》，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11月影印，第269页。



远离家乡前后达半年之久，^① 因此到外省渔场捕鱼的风险就更大了。

就其捕鱼的方式来看，有用标枪射杀鲸鱼的。据记载，广东雷州半岛捕鲸鱼时，

“户聚船数十，用长绳系铁枪掷击之，谓之下标，三下标乃得之。次标最险，盖首标常未知痛也。末标后犹负痛行数日，船而尾之，俟其困毙，连船曳至水汪处始屠，无鳞，皮黑色，厚寸许，身有三节，首下标者得头节，次得中节，三得尾节。一鱼之肉载数十余船，货钱百万，不数年辄有标而得之者。”^②

有用诱饵钓鲨鱼的。

“鲨鱼重数百斤，其大专车，锯牙钩齿，其力如虎，渔者投饵即中，徐而牵

^① 朱维幹：《福建史稿》，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版，下册第456页。

^② 《雷州府志》，转引自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3年4月版，第212页。

之，怒则复纵，如此数次。俟至岸侧，少困，共拽出水，即以利刃断其首，少迟，恐有掀腾之患”。^①

有通过辨别鱼群的声音特性以适时捕鱼的。广东沿海地区，

“白花鱼咸淡水皆有，黄花惟大澳乃有，大澳者咸水之边也。自十月至十一月，以日昃尽浮出水。渔者必以暮取之。听其声玕，则知未出大澳也，声老则知将出大澳也。声老者，黄花鱼嘯子之候也。其嘯子必于大澳，故于大澳取之。取鰵及黄皮蚬、鲚、青鳞，亦皆听其声，声齐则开罟取之。”^②

“海鱼以三四月间散子，群拥而来，谓之黄鱼，因其色也。渔人以筒侧之，其声如雷，初至者为头一水，势汹且猛，不

① [明] 谢肇淛：《五杂俎·卷九·物部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260~261页。

② [清]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下册第553页。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

可捕，须让过一水，方下网。簇起，泼以淡水，即定，举之如山，不能尽，水族之利，无大于此者。”^①

浙江

“渔俗傍海网罟，随时弗论，每岁一大渔汛，在五月石首发时，即今之所称鲞者。宁、台、温人相率以巨舰捕之，其鱼发于苏州之洋山，以下子故浮水面，每岁三水，每水有期，每期鱼如山排列而至，皆有声。渔师则以篙筒下水听之，鱼声向上则下网，下则不，是鱼命司之也。舵师则夜看星斗，日直盘针，平视风涛，俯察礁岛，以避冲就泊。是渔师司鱼命……。”^②

有掌握鱼类趋光特性而采用张灯诱捕的。如

① 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一·鱼》，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版，第751页。

② [明] 王士性：《广志绎·卷四·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版。

“鹅毛鱼，取者不以网罟。乘夜张灯火艇中，鹅毛鱼见光辄上艇，须臾而满，多则灭火，否则艇重不能载。”^①

“每见渔人贮萤火于猪泡中，缚其窍而置之网间，或以小灯笼置网上，夜以取鱼，必多得也，以鱼向明而来之故。因记忆一书云，猢猻毛置鱼网四角，取鱼必得，盖鱼见之如人见锦绣也。”^②

捕杀鲸鱼鲨鱼等巨鱼都是难度相当大的，如不小心捕杀者反而会为其所伤害，因而充满风险。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捕捞方式，在掌握所捕捞的某种鱼类的习性前，捕捞产量并不稳定，时而丰收，时而歉收。这种丰歉的不稳定给渔民的捕鱼增添了神秘感。当第一个渔民发现并掌握某种鱼类的习性从而在捕捞中获得丰收，在广大渔民的眼里，这个人简直“神了”！由于海洋渔民人身安全以及捕鱼丰歉的偶然性与不稳定性等，这

① [清] 屈大钧：《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下册第556页。

② [明] 郎瑛：《七修类稿·卷四〇·捕鱼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418页。



就在渔民中留下了广阔的海洋神灵信仰空间。

○ 海神信仰与渔业生产过程

我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期海洋渔民的海洋神灵信仰与海上渔业生产捕捞紧密地联系着，几乎贯穿着海洋渔业生产的整个过程。现分述如下。

渔汛期的首航日子多由海神确定。海洋渔民往海上捕鱼要受渔汛支配，这就决定了海洋渔业生产具有季节性，亦即周期性。在渔民眼里，每个捕鱼周期何时出海，对于捕鱼生产的丰歉至关重要。因此，古代渔民重视出海日子的选择，特别是每年第一个渔汛期的首航日子。为此，渔民往往要到海神庙焚香祭拜并以占卜确定。据《福建省志·民俗志》记载，福建沿海古代渔民于“每年春节过后，第一次出海要占卜择日，一般是到妈祖庙（又叫天后宫）进香，求问时机良辰，由神意定夺出海佳期。”^① 这种风俗至今仍然保存下来，在我国沿海其它地方也存在这一风俗。

事实上，通过占卜决定出航时间的习俗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据唐朝段公路的《北户录·鸡骨

^① 林国平主编：《福建省志·民俗志》，第27页。

卜》记载：

“南方逐除夜，及将发船，皆杀鸡择其骨为卜，传古法也。”^①

又据《汉书·郊祀志》记载：

“（汉武帝时）既灭两粤，粤人勇之乃言‘粤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百六十岁。后世怠慢，故衰耗。’乃命粤巫立粤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帝百鬼，而以鸡卜。上信之，粤祠鸡卜自此始用。”^②

这则引文中的“粤”同“越”，亦即指“古越族”，说明“鸡卜”这种习俗原先流行于生活在我国东南以及南部沿海的古越族中。笔者认为，明清以来我国东南以及南部沿海渔民出海以占卜择定日子的

① [唐] 段公路：《北户录》，《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3年影印，第六编，第1册第190页。

② 《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下》，《二十四史》（缩印本），第2册第321页。